



欧阳山 文集

第一卷：中短篇小说

欧阳山文集

第一卷：中、短篇小说

（一九二四年——一九三五年）

花城出版社

欧阳山文集

花城出版社

欧阳山文集
(第一卷)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9插页 310,000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0册

ISBN 7—5360—0089—8 / I·86

精装定价: 5.15元

自序

一

我念小学的时候，和我的养父、养母生活在一起。养父是一个写字匠，每天用大手帕包着纸、笔、墨去第七甫、第八甫那些电版工厂和石印工厂揽活，赚每百字一毛钱或两毛钱的工资，养母就在家里买菜、做饭。有时候，养母突然发现米缸里没了米，就叫我提一个小竹篮子跟着她到亲戚和朋友家里去借米。有些亲戚朋友把米缸盖打开，里面的米也并不多；有些亲戚朋友自己也没有米，就只好从床底下捡起两个红薯，塞进我的小竹篮里。我们很穷，他们也很穷，咱们的亲戚、朋友，左邻、右里都很穷。

在广州，这是最低层的角落之一。人们劳动一辈子，做牛做马，流血流汗，却得不到温饱。他们拉洋车，抬轿子，拉大板车，做肩挑苦力；好一点的就做工人、店员、小贩、杂役；强一点的就做警察、兵丁、赌徒、强盗。那些女的就做工工、绣花姐、缝补婆、神婆、媒婆以及一切迷信职业者，有一大部

分则沦为女招待、卖唱的，甚至沦为娼妓。

他们的多灾多难是世间少有的。他们不读书，不识字，没有任何的文化和教养；他们被人折磨、愚弄、斥骂和殴打；他们穿得寒伧、破烂，吃得有一顿、没一顿，住得阴暗而潮湿；他们害着肺癆、伤寒、疟疾和痢疾，孩子们长着疮、癣、疥、癩；他们迷信、酗酒、赌博、打架，互相欺骗和互相埋怨；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被投进监狱或被杀死，有不少人上吊、投井、吞烟膏和抹脖子，也有不少人因为饥饿和疾病而静悄悄地死去。

那时候“五四”运动刚过去不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劳工神圣！”、“推翻旧礼教！”、“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实行民主！”、“提倡科学！”这一大堆口号塞满了我的脑子。可惜，“德先生”和“赛先生”都不会光临到我们这个地区。我如痴如狂地读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冰心、叶圣陶、王统照，也读了高尔基、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乞诃夫、歌德、拜伦、莫泊桑、泰戈尔。他们都给我指出了许多美好的去处，但是我仍然感觉到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所写的典型性格跟我所看见的人们有些相似，又有些不同；他们所写的典型环境跟我的现实生活有些相似，又有些不同。他们书中那些人物仍然没有找到出路，那末，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二

我的亲戚、朋友，我的左邻、右里，还有我自己，——咱们还有一个可怜的，支离破碎的，多灾多难的国家。近百年

来，它打了无数次的败仗，签订了无数个丧权辱国的投降条约，割让了大片的领土，赔偿了无数银两，使得我们的日历上到处出现“国耻纪念”的字样。到了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更加变本加厉，最后激起了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

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二十年代初，我不能不为我们的国家感到担忧、羞耻和愤慨。有人说，我们这辈子人只会纵向看问题，不会横向看问题，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横向看问题的时候实在太多了。鸦片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这些事情年代久远，暂且不说。就拿二十年代来看吧，也足够叫人眼花缭乱。上海、天津都有各国的共同租界。此外，俄国和日本在东三省有自己的租界，德国在山东有自己的租界，英国在广东的九龙，广州的沙面，法国在广州湾（湛江）也都有自己的租界。在中国的土地上，客人比主人凶恶得多。客人可以打主人，骂主人，踢主人，侮辱主人，甚至强奸主人，杀死主人，而自己却逍遥法外。在这些客人的眼里，主人不过是劣等民族，可以任意欺凌。在上海外滩公园的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一个穿普通衣服的中国人，如果走进正厅售票处，就会被“红头阿三”一掌推出去，叫他到横门去买票。在广州，谁想从沙基大街走向沙面的东桥，他一定会碰见一个用鄙视的眼光望着他的外国水兵。在租界外面的港口和河湾，陈列着全世界的军舰和商船。在租界外面的城市和农村里，客人掌管着矿山、铁路、邮政和海关。他们还开设了许多教堂，办了许多教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少爷和小姐，以便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些年轻人变成老爷和太太，来替他们接管整个中国。

在各个省自然也有我们的督军和省长们。他们有时候拥护全国的政府，有时候又反对全国的政府，更多的时候是彼此互相厮杀，互相掠夺。他们对自己人很凶，对洋大人又谦恭备至。很难说他们是否知道外国人在中国那样骄横跋扈，但确实可以说他们不但不会排外，而且十足的媚外。这些达官贵人们在注意地盘、实力、捐税、钱财，也非常注意和地盘、实力、捐税、钱财有密切关系的“横向联系”。

这个国家和政府，这些督军和省长，都不来过问咱们穷苦老百姓，——正确地说，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天地间竟然有咱们穷苦老百姓的存在。不管怎么说，生活一天一天地过下去，耻辱一天比一天增加，我自己也一天比一天长大了。纵然我整天都感到担忧、羞耻和愤慨，可是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咱们的国家，咱们的穷苦老百姓，又怎么能够得救呢？不错，咱们曾经有过辛亥革命，——但那只是将昏庸腐朽的清朝政府，换了一个四分五裂，支离破碎的中华民国。咱们也曾有过一九二五年的中国大革命，——但革命势力刚到长江流域，就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背叛，使这个大革命半途夭折。中国要向何处去呢？作为这多灾多难的国家里面的一个年轻人，那末，我又应该怎么办呢？

三

黑暗没有尽头，刻板的日子一天紧接一天，辛酸的生活像珠江一样长流不尽，我的亲戚、朋友，我的左邻、右里一天比一天更加痛苦，更加忧伤。我自己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痛苦，更加忧伤。在这一点上，大家都一样，谁也不比谁更强些。

可是在别的许多方面，咱们就很不一样了。他们有惊人的智慧和精巧的手艺。男人们会做精致的雕花木刻，精美食品和各种玩具，会捕捉飞鸟，喂养蟋蟀和繁殖金鱼，会做精美的家具，会造漂亮的房屋，会通沟渠，挖渗井，也会治病、扶乩、看相和问亡。女人们会做精美的服饰，会绣鸟兽和鲜花，会剪出人物、器具、花朵、鲜果、鸟兽和虫鱼，会编织彩灯、花席、篮筐和垫套，又会用丝线编成各种形状的荷包和口袋，还会模拟生活用具做出许多铜的、铁的、纸的、草的桌子、椅子、衣服、鞋子以及其他各种东西。

他们诙谐无比，并且善于苦中取乐。他们嘲弄别人，也嘲弄自己。他们说着许多笑话、谜语，离奇古怪的行话和精辟生动的歇后语。他们喝酒、下棋、唱戏、唱歌，有时候还能自己编出新的歌子来。有些女的特别爱唱山歌、咸水歌和各地的民歌；有些女的特别喜欢木鱼、南音、粤讴和龙舟，有时候半夜挑灯，唱起木鱼书来，唱得如痴如醉，通宵达旦。

超乎这一切之上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不管是男是女，都有一颗伟大的心。他们能够和别人分享食物，分享钱财，分享衣着和分享快乐。他们即使自己只有一口酒，也可以让别人分享半口；即使自己只有一根香烟，也可以大家轮流着抽。他们自己即使忍受着痛苦，也要把快乐让给别人。到了必要的关头，他们可以为别人牺牲自己，从牺牲金钱、幸福到牺牲生命。这种伟大的心灵，并不希望得到赞美，也不希望得到报答，甚至不希望让别人晓得。

凡此种种，都是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佩服他们，敬重他们，热爱他们。——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们悲惨的命运，冲破那黑暗无边的地狱，甚至连给他们

指出改变这种命运的途径，我也办不到。他们永远在那无边的苦海中挣扎着，我也跟他们一道在那无边的苦海中挣扎着。

四

如果说，骑在咱们穷苦老百姓头上的，只有北京那些总长大人们，加上各省那些督军、省长大人们，那就不是事实了。事实上，在督军、省长大人们管辖之下，还有许许多多，数也数不清的老爷、少爷们。戴瓜皮小帽的地主豪绅们，手拿司的克的官僚买办们，便是他们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显赫人物。司的克就是英国人说的手杖，也就是喜剧大明星查理·卓别林手里拿着的那根弯头的木棍，很早以前中国就引进了的。

戴瓜皮小帽的老、少地主豪绅们，相信世道不会变，即使变了也是换汤不换药，他们可以像几千年的老规矩那样，生活下去，治理下去和剥削下去。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他们和阿Q一样，认为这是儿子打老子。将来终归有一天，出现了真命天子，就会把那些夷人们收拾干净，天下太平。他们一方面残酷地压榨剥削老百姓，一方面通过《论语》、《孟子》等等四书、五经，把精神胜利法传授给工人和农民，并且使老百姓相信，公理已经战胜了强权。老百姓当中，受骗上当的人是不不少的。例如大中华民国的某些公民，被外国人踢了一脚之后，还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吃了一只洋火腿。

手拿司的克的老、少官僚买办们，采取了另外一种不相同的态度。他们羡慕外国人，崇拜外国人，甚至有些时候对外国人阿谀谄媚。他们不但自己穿西装，说洋话，替洋人办事，有时候还会把英国说成“我们皇家”，或者把美国说成“我们美

国”，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他们认为下等人都是“蠢如鹿豕”，绝对说不出一句聪明话，或者一句有哲理性的话来。他们把中华民族叫做低等民族，仿佛他们自己身上有了洋气，成了高等华人，——虽然头发不黄，眼睛不蓝，鼻子不高，也就成了高等民族了。这样，他们当然对多灾多难的国家看不惯，觉得中国样样都不行，样样都不好。最后甚至发展到说出这样的话来：“中国不亡无天理！”有些人甚至预测道：“中国如果和日本打起仗来，只消三天就亡了！”

但是中国勤劳穷苦的人民大众，咱们的亲戚、朋友，左邻、右里，对于这种高超的论调，有些什么看法呢？对于官僚买办老爷、少爷们的高见，能够批准么？不，当然不能！那些人本来就靠洋大人为生，亡了国也许更方便些。穷苦老百姓就不一样了。他们现在已经在当奴隶，倘若亡了国，本国老爷、少爷之上，还要增加洋老爷、少爷，他们就要变成双重奴隶了。但是不管愿意不愿意，咱们可怜的国家究竟会不会亡呢？如果会的话，是什么时候呢？亡给谁呢？是几只恶狼来瓜分呢？还是一只猛虎来独吞呢？……谁也不知道。

五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我考进了一间中等学校。它的名字叫做广东高等师范附属师范学校。校舍很壮观，设备也很讲究，有高大明亮的课堂，绿草如茵的运动场，美丽芬芳的校园，幽雅清静的音乐室。我第一次走进这样漂亮的建筑物，简直好像是上了天堂一样。从此，白天我就在天堂里盘桓，晚上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地狱。由于功课忙，加上自己如饥似渴地读着文学

作品，和我那些亲戚、朋友，左邻、右里，不免渐渐地有些疏远。他们看见我是一个穿白麻帆学生制服的“先生”，也就很少和我来往。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我开始了文学创作的尝试。很显然，这个期间，我是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眼睛观察世界。《文集》中所选的《那一夜》（一九二四）、《玫瑰残了》（一九二七）、《最可怜的女人》（一九二八）、《死尸》（一九二九）、《钟手》（一九二九）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作品，可以作为这一种倾向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一些这一类的作品，我没有选进《文集》里面。

这些作品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内容上的自我表现，一个是形式上的象征主义，都明显地受过现代主义的影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家，如果从他原有的立场出发，是很容易显露出固执的自我表现的。至于在借鉴国外文学作品的时候，盲目引进了一些现代主义的手法，还沾沾自喜，以为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在当时是相当普遍，谁也不以为怪的现象。如果拿我那儿篇作品来考察，那么，《玫瑰残了》就是一个更加明显的例证。

有人说，自我表现是一种新的美学的崛起，我看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不但不是什么新的崛起，倒反而是“古已有之”的陈词滥调，把这种腐朽奉为神奇是毫无意义的。至于现代主义的某些手法和技巧，只要读者能够接受，用一点也不妨。倘若读者不买你的帐，而你却硬要塞给他们，那情形就不大妙了。当然，任何作家作为一个个人，总会和时代精神有或强或弱的联系，不可能象独自生活在荒岛上的鲁滨逊一样，因此他的自我表现也许能或多或少地具备某些时代精神。不过这样的作家

和作品，充其量只能和时代前进的脉搏，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罢了。

六

到了一千九百三十年，在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在郭沫若提倡革命文学，鲁迅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带动下，我决心抛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世界、人生，从事文学创作。从这时候起，我陆续写出了《竹尺和铁锤》、《水棚里的清道夫》、《杰老叔》、《七年忌》、《心的俘虏》、《崩决》、《明天的艺术家》、《鬼巢》、《一个广州人底迷惑》、《三水两农夫》、《好邻居》、《战果》、《流血纪念章》等一系列的作品。

然而企图毕竟只是一种企图，并不能够轻而易举地达到目的。我决心抛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然而常常抛弃不掉；我企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然而常常运用不来。不过有一点，仍然是非常明显的：我回到了我的亲戚、朋友，左邻、右里中间，用他们的现实生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实际，加以考察、研究和反映，无疑比从前前进了一大步。

世界上的文学、艺术也跟哲学、社会科学一样，众说纷纭，流派复杂。但是从根本来说，无非是唯心跟唯物两大派。按最通俗的意义来说，唯心派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认为世界怎么样，世界就算怎么样；唯物派正相反，认为世界是客观的存在，人们的认识就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反映。唯物论里面还要分机械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前者只见物质的存在，而看不见物质的运动和发展，后者不但看见物质的存在，而且看见

它的运动和发展。我当然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辩证唯物论者，我的文学作品能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规律，因而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全过程。但是，那又谈何容易呢？

回到我的现实生活来看，我不能够不考虑下面这样一些问题：我那些亲戚、朋友，左邻、右里，为什么那样多灾多难，痛苦忧伤？那些总长、督军、省长、地主豪绅、官僚买办的老爷、少爷们，为什么那样穷凶极恶，富贵荣华？为什么咱们的国家这样多灾多难，分崩离析？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又那样凶神恶煞，耀武扬威？这里面总该有一点点道理，总该有一点点因果关系吧！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找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想，人类要分化成各种各样的阶级，也许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像《一代风流》里面的陈文雄老爷那样，至死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也许不愧为一种上策。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既然有了阶级，也就不可避免地有阶级斗争。人们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终究抹杀不了它的存在。

中国的人民正在从局部的地区开始，为反对帝国主义者、国际垄断资本家，同时为反对中国的地主豪绅和官僚买办的屠杀压榨，进行着伟大的殊死斗争。作为一个人民作家，我当然希望我的穷苦的兄弟姐妹们能够从斗争中得到胜利，从被屠杀，被压榨的地狱中解放出来，并且最后从贫穷、疾病、愚昧、落后的痛苦中解放出来。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名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甚至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简直具有诱惑的力量。到那时候，人民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繁荣、富裕、快乐和幸福。我当然更加希望我能够从作品中反映这种革命生活的全过程，使我的作品在这个革命进程中，起一定的认识作用和推动作用，或多或少地促进这个革命进程的发展。共产主

义的到来虽然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如果咱们不努力奋斗，它也可以无限期地拖延，迟迟来不到人间。拿这样的尺度来衡量我这一个时期（一九三〇——一九四〇）的作品，像《文集》第一卷的大部分，第二卷的大部分，和第四卷的长篇小说《战果》，就跟这种要求相差太远了。

七

为什么对于三十年代的作品，我自己也不能够满意呢？那是有下面这样三种原因的：

首先，咱们大家都知道，文学艺术的繁荣，有赖于政治上的自由。但是，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里，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完全被国民党反动派剥夺了。即使住在上海的租界里，作家也没有人身自由，更谈不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文学艺术的创造自由了。我所写的每一篇作品，都要经过国民党老爷、少爷们的检查，否则，就找不到发表的地方，即使发表了，也无法向人民出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作品都胎死腹中，或者刚刚看见天日，就报废了，被埋葬掉了。一个作家要说什么话，只能够弯弯曲曲地说；一个作家要描写什么生活，只能够隐隐约约地写。因此，左翼作家丘东平必须把梅陇城写成梅冷城，把上海城之战写成长夏城之战，并且把中国人的名字写成俄国人的名字。也因此，我在三十年代的作品中，也采取了欧化的表现方法。因为欧化检查官们也可能看不懂，从红笔底下侥幸漏了过去。同时也因为欧化，有时读者也看不懂了。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随手举几个例子吧：读者在《文集》第一卷里，可以找到

一篇叫做《杰老叔》的小说。它本来的名字叫做《还有国家的奴隶》。送检以后，正文还可以，题目无论如何通不过，只好妥协，改成现在的名字。又有一篇小说，叫做《心的俘虏》。这篇文章是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散布所谓赣南剿共大捷的谎言而写的，没有经过检查官们的检查，只能发表在鲁迅所编的，像地下刊物一样的《木屑文丛》里。但是结果怎样呢？这部书一出版就遭到了查禁。又譬如，在《文集》第二卷里，有一篇中篇小说《鬼巢》。我采用了欧化的表现方法，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残酷的血腥屠杀。事实是，在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把他们认为是共产党员的好几百人，关押在广州的南关戏院里，然后用机关枪加以扫射。这样的一本书，如果不用欧化的表现方法，不从侧面去反映，那么，它能在三十年代的良友图书公司公开出版，将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奇迹。

尽管这样，有一些以文艺的护卫神自居的理论家如胡秋原之流，竟然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要求文艺自由，并发出“勿干涉文艺”的叫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当时在上海一来没有政权，二来手无寸铁，怎么能够“干涉”胡秋原之流的“文艺”呢？相反，当时党和革命作家正在帮助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胡秋原之流竟然走错了门口，实在是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咄咄怪事！

八

其次，一个作家要真实地反映一个时代，必须投身到这个时代的革命政治的主流里面去。但是当时中国的作家，和当时

革命政治的主流——江西的中央苏区，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完全隔断了的。中国左翼作家对中央苏区的斗争情况，只能通过秘密刊物的简单记载，或者仅仅通过人们的简略的口头传达，才能够略知一二。作家没有办法亲身到中央苏区去生活，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那里的人和事，又怎么能够产生令读者满意的作品来呢？鲁迅曾经对我们说过，他想写一个关于红军的战斗故事，终于因为生活上被隔断，而未能如愿。

即使作家们住在上海的租界里，他们和工人、店员们的联系，也是被国民党的特务和租界的警探隔断了的。作家要和工人、店员们见一次面，谈一次话，只能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如果要开一次读书会，或者一次革命性质的纪念会，那就要采取高度秘密的方式。如果一个作家要深入到罢工工人里面去活动，那么，他除了要有熟人率领之外，还必须经过严格的化装，才能成行。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作家是连当地基本群众的斗争生活也没有法子作真实的反映的。

对于生活上的这种被隔断的状态，我和一些同志曾经做过冲破它的努力。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广州普罗作家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所出版的《广州文艺》、《新地》、《大家新闻》这些刊物，曾经直接送到一般工人、店员和太古洋行码头的罢工工人手里。工人们高兴极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老爷、少爷们大为震怒。他们扼杀了这些用广州方言出版的刊物；对我下了通缉令，使我不得不离开广州到上海；又派遣特务拘捕了留在广州负责的龚明和易巩。最后，令人十分愤慨的，龚明在被捕三个月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易巩则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咱们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遭遇呢？唯一的理由，就是咱们胆敢把本来应该属于人民大众的文学创